

“文献”、“文献学”及其它

吴小如

这篇小文原是平时读书的零星札记。为了引起读者注意，才化零为整，煞有介事地改用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与内容并不相称。应该承认，此文仍属“不贤识小”的僇衎之作。

一 释“文献”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其后又见于《礼记·礼运》等篇，要之皆据《论语》之文而有所增益。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注，朱熹《四书集注》，皆训“献”为“贤”。后儒更引申之，谓“贤”指贤才和耆旧两层意思。古今学者对此大抵无异说。前几年，《文献》杂志曾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讨论“文献”一词的概念与范畴，所见各有异同，而于“文献”之训诂则未提出新的解释。当时因兹事体大，未敢窃吹于群贤之列。今不揣疏陋，姑陈鄙见，聊充芹曝。

按，“献”之繁体字作“獻”。“虞”为鬲属，鬲为鼎属，皆古器物名，多用以盛祭品。“獻”者，盛犬于虞中，以献祭祖先神祇，是会意兼形声字（“虞”亦声）。笔者因疑“献”即“虞”之通假字。盖“文”者泛指文字记载，“虞”者泛指前代器物。有了文字记载和前代器物（当然指礼器、祭器），然后古礼始可

取征。如释“献”为贤人，则杞、宋去夏、殷已久，即使有高年耆宿，也不能活到几百岁以上。况于文字记载和前代器物，可以用“足”或“不足”去形容它们；而贤人则不可能像军队一样，有既定名额，似不宜以“足”或“不足”形容之。今考古学界每用“文物”一词，其实正与“文献”之初义相近。

然“献”之训“贤”，乃汉儒旧说，于读古书时其义亦不可废。如《文心雕龙·序志》有“黎献纷杂”之语，“献”即训“贤”。惟近人注释《文心雕龙》，大都解“黎献”为黎民中之贤者。鄙意则以为“黎”指黑发人，亦即年轻人，犹秦汉时称一般人为“黔首”。而“献”指耆旧，为老年人。两字乃并列复合词，“黎”并非“献”字的定语。

二 “文献学”与“古籍整理学”

几年前学术界有倡言应专设“古籍整理学”学科，而不用较早流行的专名词“文献学”。当时也有人不同意，仍主张用“文献学”。有熟人来询问我的意见，我因没有想过，当时未置可否。近时我想，如果我对“文献”二字的讲法能够成立，则“文献学”的内涵实包括古籍整理和考古学两方面的工作，较之仅称“古籍整理学”的范围要宽泛得多。新版《辞源》“文献”条注云：“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则所谓“图书”实不限于古籍。且“古”、“今”本相对而言。辛亥革命前后的作品在“五四”时期还属“现代”，而今天则统归之于“近代”。况且整理图书资料是长期性的工作，必不限于今天所谓的“古籍”，已是自然趋势。“五四”时期的作品，虽说属于“现代”，实际上迟早也要变成“古籍”的。因此我目前的想法已倾向于沿用“文献学”的旧名。下一节便想谈谈整理“今”籍的问题。

三 整理“今”籍未必易于整理古籍

一说到古籍整理，便认为那是一种专门学问；其实治现代文学的人也必须具备相当广泛的文献学的常识，才不致出现谬误。

姑举一例。周作人晚年写了不少旧体诗。其中《儿童杂事诗》有一首谈“五黄”，而“五黄”是包括黄鱼在内的。周氏诗中用了“石首”一词，有人不解其意，硬把“首”字说成是“榴”字之误。其实黄鱼又称石首鱼，稍具博物知识的人都应当知道。这一改就暴露了改字人的更多的弱点。盖律诗讲究平仄，“榴”为平声而“首”为仄声，在周氏诗中是不允许以“榴”字取代“首”字的。可见这位研究者对旧体诗格律也缺乏常识。更令人担心的是，改字人不但犯了主观臆断的毛病，而且还反映出其思想深处并不认为缺乏这一类基本功是危险现象，相反，却把这一类起码的常识看成无伤大体的细节小事。这样下去，即使是整理“今”籍只怕也难免错误百出了。

周作人写的毕竟还是旧诗。这里我要提醒做文献工作的同志，即使是通俗文学，所谓不登大雅之堂之作，也未必一看就懂。否则研究宋词、元曲、话本、传奇以及明清小说中的词语，就不会成为专门学问了。而“敦煌学”之形成，不正是由于时代久远，今天读唐代通俗作品竟处处遇到“拦路虎”，才出现这门学问的吗？远的不说，即以目前尚在流行的京剧而言，无论为剧目作提要，或为台词作校勘，也并非简单省力的工作。有人写书，自称是“学术著作”，却连梅兰芳的个人本戏《太真外传》和自汉剧演变而来的传统京剧《贵妃醉酒》都没有分辨清楚而混为一谈。其道理同不知《尚书》有今古文真伪之分是一样的。周汝昌先生曾就《法门寺》刘瑾的一句定场诗“何必西天拜佛成”的“成”字乃“诚”字之误写过一篇考证文章，我同意他的看法，并为他找出一条旁证。盖清人李玉所撰《一捧雪》传奇中有

一角色名莫诚，而现在的京剧剧本都写作“莫成”了。可见校订戏词也要懂一点校勘学知识。至于京剧剧本中有些方言俗语，意义上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可以说不胜枚举。如京剧中称皇后、王妃为“梓童”，至今不知其出典；《卖马》、《盗宗卷》两剧的主角动辄说“有恻悔”，意谓向对方道歉，并没法弥补过失；但“恻悔”两字究竟应怎样写，确切涵义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小说、戏曲中习用口语“却又来”，从上下文看，也不止一种意思，因此也就很难给这个词语下一确切定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我们今天不用文献学的眼光、不从整理文献资料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则不久的将来连这一批作品也会像敦煌变文一样难懂费解。

四 对待古籍整理要持严肃慎重态度

尽管这几年出版业萧条疲软，但新整理出版的古籍仍不在少数。这些新整理出版的古籍，以句读标点方面的错误为最多，其次则校勘和注释亦多有可商榷之处。我们从每一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上所刊载的文章便可看出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提高整理者的文化素养和业务水平固然是当务之急，但我以为如何对待这项工作还有个态度问题。从已公开出版的图籍中，我们不难看到所谓经过整理的书，实际上有不少是近于粗制滥造的。破句误读和讹字错简几乎触目皆是，应接不暇。这本身就反映出无论整理者或出版社对于古籍整理工作并非全力以赴，一抓到底。另一种情形则是在治学方法上不慎重缜密，失之武断。比如有一篇分析白居易〈长相思〉词的文章，把这首词认定是唐代开成五年（840）白居易六十九岁时在洛阳遣送歌伎樊素后为思念她而写的。文章的作者讲得头头是道，看上去似乎无懈可击；而事实上却没有举出任何过硬材料做为依据。我们应该认清一个前提，即这次樊素的被遣送，不管是她本人自

请离去，还是白居易下了决心主动将她遣出，总之樊素这一去再不会回来是肯定无疑的。然则词中“恨到归时方始休”一句便完全落空，无论如何与樊素也搭不上关系了。与其说这首词是白居易伤心于爱妾远离，我看还不如讲成游子思归或思妇盼游子归来更贴切词意。固然说诗无达诂，但必须揆情度理，能讲得自圆其说才好。而当前有些所谓学术著作，往往仅由个人凭空悬揣，如黑格尔之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一样，只存在于自己头脑之中。这也是我们整理古籍时经常看到的通病。我曾试加探讨，古今学人著书立说，其目的无非要做到“订讹”与“传信”。如果古籍经过整理，“讹”愈多而“信”愈少，岂不事与愿违，南其辕而北其辙乎？何况订人之讹易，订己之讹难；传己之信易，传人之信难。敢于传人之必信而订己之必讹，那就得有点自我批评的精神，和服从真理的勇气，则尤其不易了。愿以此自励焉。

1991年6月在北京写论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